

文章编号:1674-8107(2015)01-0054-07

论毛泽东的群众感情观及其现代性焦虑

代红凯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00)

摘要:毛泽东是一位极富群众感情的领袖,与生俱来的对于底层大众的深厚感情伴随着毛泽东的一生。毛泽东对底层人民大众的感情有五重维度,即同情心、尊重心、学习心、拯救心、服务心。这五重感情内在贯通,紧密联系,构成了毛泽东的群众感情观。毛泽东的群众感情是他奉行群众路线的感情基础,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他对中国社会问题的认知和决策。建国后,面对社会现代化过程中政治权力异化及人民大众在经济、文化等社会结构中被迅速底层化、边缘化和固定化的现代性问题,毛泽东陷入了深深的焦虑之中。

关键词:毛泽东;群众感情;现代性焦虑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4-8107.2015.01.010

毛泽东一生信奉群众路线,建国以后更是时刻重视群众路线的贯彻实施,并高度警惕社会各领域脱离群众的问题及倾向。而毛泽东自始至终纯粹的群众感情是他践行群众路线的感情基础。建国后,在国家工业化、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面对底层人民大众不可避免地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结构中陷于底层化、边缘化并且固定化的现代性问题,毛泽东陷入深深焦虑之中,并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艰辛的探索。目前学界对于毛泽东群众路线的研究已不胜枚举,但尚无专门的论著对毛泽东群众感情的内涵进行精确细致地界定,也没有从群众感情的视角来解读毛泽东的问题意识。本文拟对毛泽东的群众感情及毛泽东基于这种感情的现代性焦虑进行初步探讨。

一、毛泽东群众感情内涵的五重维度

毛泽东出身农家,对中国底层民众的生活境遇有着特殊的理解和感情。纵观毛泽东的一生,毛泽东因为看到底层人民群众的疾苦而动情落泪的事例数不胜数。1975年夏天,由于连降暴雨,河南

省南部发生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洪涝灾害,当地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一天,工作人员给毛泽东读有关河南水灾的内部报道,当读到受灾某县仍有大批群众处于危难之中,解放军救援队伍赶到现场时已有几十名群众丧生,工作人员忽然听到抽泣声,这才发现,毛泽东眼中早已充满泪水,面部表情极为伤感。毛泽东自言自语道:“我这个人感情越来越脆弱了。我一听到天灾人祸,就忍不住伤心。”^{[1](P2715)}可以说,这种对底层大众的深切关怀,对贫苦人民的真挚感情贯穿着毛泽东的一生。

走群众路线,必须要有群众感情。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知识分子建立与人民大众的感情问题,结合自身的成长经历,作了详细论述。他强调,对待人民大众感情的变化是一个人阶级属性、立场观点变化的关键,“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2](P852)}如果感情上没有这个变化,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无法真正地实现大众化的目标,也无法真正践行群众路线。但是,毛泽东这种抽象的群众感情又该如何理解呢?什么是群

收稿日期:2014-04-25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毛泽东对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项目编号:2014118010202)。

作者简介:代红凯(1989-),男,河南商丘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毛泽东思想研究。

众感情呢?它的内涵该如何清晰界定呢?笔者认为,这种群众感情主要有以下五种维度。

(一)同情心

对底层大众充满同情心,是毛泽东群众感情的第一个维度。毛泽东自青少年起,就对底层民众的受苦受难怀有深重的怜悯同情之心。1936年毛泽东在与斯诺的谈话中,回忆起影响了他一生的长沙抢米风潮事件,在当时很多学生“不过把这事当做一个具有刺激性的事件,感觉兴趣而已”时,毛泽东却“永不忘记它”,因为他“觉得这些‘叛徒’都是与我的家人一样的普通农民,于是我深恨对待他们的不公平了”。^{[3](P33)}这种同情心构成了毛泽东群众感情丰富内涵的最基本、最重要的层次。

毛泽东对人民大众怀有同情心的原因甚多,有来自先天家庭出身、成长经历、父母双亲的影响,也受到后天实践经历、人生哲学的默化。毛泽东出身旧中国典型的农民世家,他的父亲和母亲都是普通的农民,他童年的生活体验、最初的人生思考都是在底层的农村环境中实现的。可以说,中国农村淳朴厚实的乡土文化和人文理念影响了毛泽东的一生,他的生活习惯、言谈举止、思维方式、人生理念、价值追求无不与中国最广大、最底层的农民大众有着密切的关系。

毛泽东这种与生俱来的同情心,与他幼时受到母亲贤惠、诚善的品德感染也有很大关系。他的母亲文七妹是一位勤劳、善良、品德高尚的女性。她虔信佛教,心地极为善良,对穷人很有同情心。她经常瞒着毛顺生,悄悄送米送粮接济贫苦的乡亲们。她去世后,毛泽东从长沙回家奔丧,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来悼念母亲:“吾母高风,首推博爱。远近亲疏,一皆覆载。恺惻慈祥,感动庶汇。爱力所及,原本真诚”。^{[4](P374)}后来,毛泽东在和斯诺的谈话中,饱含真情回忆起自己的母亲:“我的母亲是一个慈祥的妇人,慷慨而仁爱,不论什么都肯施舍。她很怜惜穷人,在荒年,她常常施米给那些跑来乞讨的人”。^{[3](P27)}文七妹这种悲天悯人、施救穷者的高尚品德对毛泽东一生的情感定向影响极深。

自然,后来领导农民战争的实践需求也要求毛泽东必须更进一步去了解农民、熟悉农民,不断在生活实践中强化对底层民众的同情、关怀。除此之外,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

群众史观也为毛泽东的重视农民、依靠农民、拯救农民、服务农民的人生理念提供了哲学支撑,更进一步强化了毛泽东的群众感情,坚定了他走群众路线的自信。童年的成长经历、革命战争的现实诉求、政治统治的依靠基础、群众史观的哲学支撑与个人的人生旨趣融会贯通,汇聚成毛泽东坚定的“群众感情”信仰。

(二)尊重心

作为毛泽东群众感情第二个维度的是对底层民众的尊重心。毛泽东一直强调政治工作人员、知识分子在与民众的接触中,要尊重农民,要尊重工人,要尊重这个挣扎在社会底层的穷苦阶层,不要看不起他们,不能看不起他们。这种对底层民众发自内心的真诚尊重,是毛泽东阶级感情的第二重维度。

由师秋朗执笔的师哲回忆录《峰与谷》里有一篇专门讲到毛泽东尊重底层民众、对劳动人民怀有深沉而真挚的感情。当时毛泽东在延安的邻居是一家姓杨的贫农,受制于当时的条件,他们的生活条件、卫生条件都是很差的。毛泽东很是感慨地对师哲说:“老百姓不懂得什么叫卫生,也没有条件洗澡。他们辛辛苦苦劳动,还被人瞧不起。”^{[5](P158)}师哲还回忆起另外一件事,有一次他陪毛泽东从杨家岭出来,在延河边上散步,看到一位作家手里拿着拐杖,边走边在空中打挥舞,碰到农民赶着运盐的毛驴队,视而不见,将毛驴队挤到了道路的最边沿,行若无人。毛泽东极其生气,他说:“这是流氓行径,目中无人!他看不起劳动人民,只是因为他认识几个方块字,就不把老百姓放在眼里,坐在人民头上显威风。他们只比老百姓多这么一点知识,就骄傲自大,目空一切,摆臭架子!根本不想他日常吃的用的是哪儿来的,谁供给的!”^{[5](P159)}毛泽东尊重民众,对所有轻视农民、侮辱农民、压迫农民的事都是强烈反感和谴责的。为此,他多次告诫知识分子不要脱离人民群众,不要脱离占人口大多数的工人和农民,更不能看不起他们。^{[6](P397)}

在同情底层人民群众的基础上,对他们抱以尊重心,予以真诚地尊重,是毛泽东阶级感情的第二重维度。这种尊重,既包含毛泽东自身的情感取向,也折射出他唯物史观的哲学理念。劳动人民是人类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他们的辛勤劳动支撑了整个社会的发展与运行。所以,他们是

了不起的,是值得尊重的,不应该、也不能看不起他们。

(三)学习心

学习心是毛泽东群众感情内涵的第三个维度。知识分子、政治工作人员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要了解他们的生活习惯和社会需求,要在与底层民众的交往中汲取文艺创作的原料、审定政策制定的规范。这种学习心态与毛泽东的哲学认识论有着深切关系。

实践是认识的来源、检验标准和最终归宿。毛泽东认为,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7](P320)}而工人、农民不仅身处社会实践活动第一线,内蕴着大量非显性、待挖掘的知识材料,而且从群众史观来看,他们潜在的社会能量正是决定整个社会发展前途的关键因素。“你看谁人知识高呀?还是那些不大识字的人,他们知识高。决定大局,决定大方向,要请无产阶级。我就是这么一个人,要办什么事,要决定什么大计,就非问问工农群众不可,跟他们谈一谈,跟他们商量,跟接近他们的干部商量,看能行不能行”。因为“知识来源于群众”^{[8](P454)},所以,在毛泽东看来,无论是知识分子进行文艺创作,还是政治工作人员制定方针政策,都要有一种向底层民众认真学习、请教的心态,都不能离开对底层民众的学习和了解。“许多东西单从书本上学是不成的,要向生产者学习,向工人学习,向贫农下中农学习,在学校则要向学生学习,向自己教育的对象学习。”^{[9](P271)}而且,也只有真正树立一种向民众认真学习的心态,才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才能真正践行群众路线。

(四)拯救心

毛泽东群众感情的第四个维度是拯救心,即以超世英雄的姿态,将禁锢底层民众的枷锁打破,重构社会结构的金字塔,将颠倒了的世界翻转过来,使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广大民众翻身成为社会的主人。毛泽东自青年时就为历史中的伟大人物所感染,怀有一种英雄救世的情结。他在与斯诺的谈话中回忆起青年时读书的兴趣所在:“我心醉于中国古代的著名君主——尧舜、秦始皇、汉武帝的史实,读了许多关于他们的书籍。……在一本《世界大英雄传》的书中,我又读到拿破仑、俄国卡德

林女皇、彼得大帝、惠灵顿、格拉德斯屯、卢梭、孟德斯鸠及林肯”。^{[3](P37)}毛泽东在书中圈点最密的也是这些大人物的传记。他对这些人物的历史功绩深表钦佩,盼望中国有类似的人物出现,以拯救民族危亡。他在将这本书归还萧三时说:“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10](P48)}而对超凡历史巨人的这种向往和认同,对底层民众的怜悯与同情,使得毛泽东自青年起就怀有一种拯救普天黎民的救世情怀。他在给黎锦熙的信中将巨人拯救弱者、君子解救小人的思想清晰地表达了出来。他说:“小人累君子,君子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因为小人物是可怜的人,所以对他们应抱以慈悲的心怀,而他们是自己的同胞,就不能眼看他们沉沦而不施救,“吾等独去,则彼将益即于沉沦,自宜为一援手,开其智而蓄其德,与之共跻于圣域”。大人物拯救小人物之后,天下人皆为舜尧,再没有可怜愚弱之人。所以,拯救小人物就是为实现自我人生价值,“大同者,吾人之鹄也。立德、立功、立言以尽力于斯世者,吾人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也”。^{[4](P75-76)}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仍怀有一种解放民族苦难的沉重心态,“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2](P1005)}这种对底层民众的拯救心态,也是毛泽东不畏险阻追求革命胜利、且建国后仍艰苦奋斗建设社会主义以实现国富民强的情感根源。

(五)服务心

服务心是毛泽东群众感情内涵的最终层次,也是最高层级的感情。拯救底层民众的最终目的不是统治他们、压迫他们,而是要全心全意为他们服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即因为中共的执政权力是依靠农民革命所得,“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11](P277)}饮水思源,所以共产党人在执政以后,仍要和群众紧密联系,不能脱离他们。权力来源于此,权力的维持、打破“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亦根系于此。所以,建国后毛泽东更加重视群众路线,一再强调共产党就是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9](P285)}不管其实际结果如何,从初衷、从最初

动机来讲,毛泽东都是心系民众,始终对底层人民抱以服务之心的,他也为纠正建国后各领域脱离群众的不正之风不懈奋斗。

同情心、尊重心、学习心、拯救心、服务心,是毛泽东群众感情内涵的五重维度,五者之间彼此贯通,从同情到拯救再到服务,构成了毛泽东完整的群众感情观。毛泽东丰富、真挚的群众感情是他群众史观在实践斗争中的映像,也是他坚定群众路线,一生站在底层群众、站在被压迫者、站在小人物立场上进行谋略规划的感情基础。正是这份纯真朴实的群众感情,致使毛泽东在建国后面对国家工业化、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各领域存在的脱离群众的倾向陷入了深深的焦虑之中。

二、群众感情视域下毛泽东的现代性焦虑

“现代性”是一个近些年来在学术界颇为前沿的术语。现代性一词起源于西方,最早是从15世纪后期的文艺复兴和航海大发现开始的,最近的表现是20世纪初期针对艺术、建筑、精神分析学所提供的一种新的自我检视的方法。从字面上来说,现代性就是现代社会的性质或特征。现代性内涵宽广,其包括世俗化、商品化、工业化、城市化、官僚化和全球化等历史趋势;也包括现代科技、全民教育、民族国家、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等社会现象;包括文化领域中的现代主义和现代文化。时至今日,尽管现代性计划在全球的发展执行相当成功,但是,也产生了许多为早期启蒙运动思想家始料未及的后果:经济上庞大利益集团的形成及对社会大众的剥削依然存在;政治集团的官僚化及由经济上的不平等导致政治上的平等徒具形式;文化领域出现精英主义的倾向;生态恶化导致的生存危机以及社会阶层的固定化、阶层流动停滞化等问题。概言之,即是经济集团化、政治官僚化、文化精英化、生态危机化和社会阶层固定化。

现代性问题普遍存在于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各个国家之中,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亦是如此。毛泽东领导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既是一次驱动着古老中国由农业转向工业、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艰苦探索,同时又对上述现代性问题予以强烈关注和深刻思考,强烈地体现出对于现代性种

种弊端进行反拨的价值维度。纵观毛泽东的晚年岁月,究其根本上来说,其一直在思考着怎么解决在社会转型、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必然出现的两大现代性问题,这两大问题可以说直接导致了毛泽东晚年深切的焦虑意识,影响着他对中国未来发展走向的认知,决定了其晚年政治思想的规划和策略。而基于底层大众的立场对现代性问题予以审视和反思,进行解决现代性问题的路径探索和构建,是毛泽东关于现代性认识的鲜明特征和主要内容,而正是毛泽东对于底层大众诚挚坚定的同情心、尊重心、学习心、拯救心、服务心的感情,构成了其现代性焦虑、现代性问题意识的感情基点。毛泽东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进行的解决现代性问题的尝试,其目的也正是为在政治领域消除政治权力脱离人民群众的异化现象,真正实现人民民主;在经济领域避免利益集团的形成,保障底层民众参与经济发展过程、享有经济发展成果;在文化领域破解精英与大众的对立这一历史性难题。

(一)毛泽东对政治领域党执政权力异化问题的焦虑

在政治领域,如何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党和政府工作人员贪污腐败、脱离群众等权力异化问题,是毛泽东现代性焦虑的第一个问题。他对这个问题保持了高度的重视,因为“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所以,毛泽东一再强调国家干部要保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12](P1576)}1964年12月12日,毛泽东阅读了在洛阳拖拉机厂蹲点的第八机械工业部部长陈正人给薄一波的信。信中说:经过蹲点,“开始发现了厂里从不知道的许多严重问题”,“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一部分老干部在革命胜利有了政权以后,很容易脱离群众的监督,掌管了一个单位就往往利用自己的当权地位违反党的政策,以至发展到为所欲为。而像我们这些领导人,官僚主义又很严重,对下面这些严重情况又不能及时发现。这就是在夺取了政权之后一个十分严重的危险”。“干部特殊化如果不认真克服,干部和群众生活距离如果不逐步缩小,群众是必然会脱离我们的”。^{[13](P268)}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上批了一些分量很重的话:“我也同意这种意见。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

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指同吃、同住、同劳动),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1](P2356)}这是毛泽东首次提出“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概念。他担心,干部严重脱离群众的状况如果发展下去,会变成“官僚主义者阶级”,而最终的结局就是重蹈历史周期率的悲剧。

毛泽东多次发动群众推行反官僚主义运动,正是为了确保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强力坚守群众路线,确保整个党不变质、国不变色。他曾对身边的护士长吴旭君说:“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1](P2357)}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期,毛泽东在1963年5月9日向全国转发了浙江省委办公厅的一个文件,这个文件本名是《一批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毛泽东阅后,将文件名改为《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并为这个材料写了1300多字的批语。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意义,他写道:这次运动“又是干部和群众一道参加生产劳动和科学试验,使我们的党进一步成为更加光荣、更加伟大、更加正确的党,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1](P2287)}晚年他在谈起国家机关改革的准则时,指出:“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14](P477)}不论毛泽东探索解决政治领域现代性问题的最终结果如何,不可否认的是,他一直都在苦苦思考、艰辛探索着一条既能稳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又能消除权力集中所带来的脱离群众等官僚主义问题的路径。

(二)毛泽东对经济领域工农大众边缘化、底层化、固定化问题的焦虑

在经济领域,如何解决社会转型时期,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政治上作为社会主义制度领导阶级的工农大众在经济领域被迅速边缘化、底层化、固定化的问题,是毛泽东现代性焦虑的第二个问题。

在农业领域,毛泽东之所以坚决不同意在农村实行分田单干和包产到户,其根源正是他注意到一旦推行单干包产,势必会迅速使农村发生阶级分化,“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的时间就看出农村阶级分化很厉害。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在他看来,农村阶级分化的结果就是直接造成贫苦农民破产,“其中有四属户、五保户,这恰恰是我们的社会基础,是我们的依靠”。^{[1](P2207)}所以毛泽东在听到田家英反映农民要求包产到户的情况时,反应就比较冷漠,他说:“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要搞包产到户就不能听。”^{[1](P2194)}仅从毛泽东个人角度来讲,使农村阶级迅速分化的包产到户政策对饱含群众感情的毛泽东来说是不可接受的。

在工业领域亦是如此,在搞经济建设的过程中,科技的重要性使得专家和科技人员日益处于生产的中心地位,因而世界各国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都逐步走向专家治国,形成技术官僚统治的局面,这与共产党历来依靠工人、农民的传统发生了严重的冲突。毛泽东固然也致力于将两者统一起来的探索,并形成了他称之为“鞍钢宪法”的卓越成果。但是当两者形成冲突、当有可能形成危及工人、农民主体地位和根本利益的技术官僚的统治倾向时,他便毫不犹豫地倾向工农倾斜。毛泽东十分重视吸取苏联“专家治国”的教训,从1958年起,他多次强调批判专家路线、白专道路,并把这种批判视为坚持中国自己建设道路所必需的。他这种做法虽被实践证明极不利于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但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尊重和突出专家作用的同时,确保普通工人、农民的主人翁地位,仍是需要在实践中探索和完善的重要课题。诚如莫里斯·麦斯纳所言:“通常人们所理解的毛泽东的‘反技术倾向’并非就是反对现代技术和现代科学的倾向,而是他对现代技术造成的社会结果与政治意义表现出的深切关注。”“毛泽东并没有对学习现代科学技术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提出异议,但是他关注的是怎样掌握和由谁掌握现代科学技术。毛泽东认为科学技术在政治上并不是中立的事物,如果放任自流,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就会产生技术特权阶层、培养官僚主义和社会不平等。”^{[15](P284)}这种深切的关注也反映了毛泽东坚定

的工人阶级立场和关注底层民众命运的深厚情怀。

除此之外,在文化领域,建国后毛泽东对知识分子日渐脱离人民群众的倾向也十分不满:“有些自己宣布自己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知识分子,一遇到工人阶级触动他那个小小的‘独立王国’的利益的时候,就反对起工人来了”。^{[14](P531)}为此,他多次号召要进行教育制度的改革,要实现教育与实践、教育与大众的紧密结合。

三、结语

毛泽东基于深厚的群众感情上的这些焦虑和感触是很深刻的。它的实质就是人类在进入阶级社会后特别是在迈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中发生激烈的分化,产生种种巨大的差别,使广大普通民众处于贫穷、落后、无保障、愚昧、狭隘、片面、低能的境地。他们被卷入社会现代化的漩涡之中,不能自主,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被社会的现代化发展甩到边沿、底层,在思想意识上也从属于统治阶级,从而企盼着接近金字塔的中心、顶层。^{[16](P508)}难能可贵的是,毛泽东关注到了这个现代性难题,他也进行了深沉的思考,苦苦求索着能设计出一条打破社会金字塔结构,消除社会的片面、人的片面的社会现代化道路。但是,毋庸讳言,毛泽东为解决基于群众感情之上的现代性焦虑而采取的决策,在实践中出现了重大失误,甚至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失误,这是终身饱含深厚群众感情、追求小人物不再被边缘化、能与君子共至大同的毛泽东的悲剧。我们应当对毛泽东的现代性焦虑思想进行具体分析,合理地继承这份宝贵的思想遗产。

毛泽东基于群众感情之上解决其现代性焦虑、解决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现代性难题出现的重大失误有着深层的社会文化心理根源。在传统农业社会里,被社会结构固定在底层的人民大众,在艰辛生存和追求发展的过程中,往往存有一种渴

望被同情、被尊重、被学习、被拯救、被服务的社会心理。而以拯救黎民为己任,且具有真挚、深厚群众感情的毛泽东恰恰能够呼应、满足底层大众的这种心理需求,并以这种感情为沟通媒介实现与底层大众在思想上、心理上的联结与互动,从而产生极大的社会号召力和动员力。一方面,毛泽东真诚地、竭尽全力地站在群众的一方爱护群众,在一定程度上会极大地助长群众的积极性,有时甚至会形成一种狂热的社会氛围;另一方面,群众对领袖的坚定信念和热情拥戴则会助长毛泽东的个人自信。这种感情上的互动与演进,其所产生的社会实践的效果则是双面性的,既能带来创造,也会产生破坏。当毛泽东的思想符合中国实际,能够实事求是地反映中国问题时,这种群众与领袖在思想感情上的相通与互动,在实践中往往能够产生较快、较好、较大的社会效果;而一旦领袖的思想脱离了国情,不再能够实事求是时,这种双方的互动则又会对整个社会产生较大的负面作用。以事实求是的精神践行群众路线,解决群众问题,这是需要后人认真总结和借鉴的。

尽管毛泽东的群众感情观及其现代性焦虑的思想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有些观点带有特定历史的印记,有些观点仍需要我们继续认真深入地进行学理研究和辩证分析,但总体来说,毛泽东的这些基本思想,尤其是其群众感情观及其现代性焦虑所蕴含的基本精神,对于中国共产党在当代坚定群众路线、完善改革的目标及其价值取向仍然具有重要启示价值。党的十八大指出,“只有植根人民、造福人民,党才能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在全党要求紧密联系群众、坚定践行群众路线的今天,重新学习和研究毛泽东的群众感情及其现代性焦虑思想,无疑可以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只有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真正地树立群众感情观,真正地解决群众在社会现代化过程中所遭遇的切身问题,才能真正践行群众路线,才能真正赢得群众的拥护,才能使党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参 考 文 献

- [1] 逢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6)[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2] 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3] [美]埃德加·斯诺.毛泽东自传[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
- [4] 毛泽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 [5] 师哲.峰与谷[M].北京:红旗出版社,1992.
- [6]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 [7] 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8] 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 [9] 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10] 高菊村.青年毛泽东[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 [11] 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 [12] 逢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4)[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13]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 [14]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 [15] [美]莫里斯·麦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
- [15] 邢贲思.中国哲学五十年[M].沈阳:辽海出版社,1999.

On Mao Zedong's View of Mass Compassion and its Anxiety of Modernity

DAI Hong-kai

(School of Marxism,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00, China)

Abstract: As a leader with deep compassion toward the mass people, Mao Zedong in all his life kept deep feeling with lower class folks. Such feelings consist of five dimensions, i.e., sympathy, respect, appreciation; savior and service. Interwoven and internally related with such feeling, his compassion of mass laid foundations for his mass-line and to certain extent determined his understanding and decisions of China's social problems. That's why, after the found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Mao Zedong was entrapped in heavy anxieties when facing the problems of modernity that political power got wrongly used through China's social modernization process and the mass people were rapidly pushed to the fixed bottom, peripheral in the Republic's economic and social structures.

Key words: Mao Zedong; mass compassion; anxiety of modernity

(责任编辑:韩 曦)